

2017年,农历五月初二,公历5月27日,适逢父亲八十岁大寿。这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日子,我不是有意要赶在这一天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当我写好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是泪流满面的,我真想像最后一句话说的的那样,朝着一座全新的寺庙全身心地跪下去。

又是一个通宵。我拉开窗帘,已经是早晨八九点钟,上海的天非常非常蓝,云不白不红、如有如无地挂着,尤其是风不轻不重、不冷不热地吹着,中间夹带着万物生长的气息。楼下传来两个孩子的议论,大意是在楼顶上起起落落的,到底是一群什么鸟儿,为什么会飞得那么快,为什么不停地飞出去又飞回来?我朝着楼下告诉他们,那是一群鸽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笔下的父亲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儿子陈元的单位也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当时的对话还在耳边:陈先生指着下边说,那边飞的是什么?野鸡不像野鸡,老鸽不像老鸽。陈元说,那是鸽子。陈先生上,鸽子有什么用吗?陈元说,可以送信。陈先生上,难怪飞得那么快。陈元说,古代人养鸽子用来送信,如今养鸽子大部分是为了吃肉。我看了看《后土寺》的编号,已经达到了226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打开了226次,从头开始了226次。

对于自己的人生,我喜欢拿来猫来比喻,说自己就是一只猫。猫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不过,经过了重重磨难和人生悲欢,其中六条命不晓得死在什么时候,也许在上一个轮回,也许在这个轮回,如今仅仅剩下三条命了。我用第一条命真诚地爱着我的每一个亲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蚂蚁、胆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机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条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传统媒体,在日益物化、浮躁不堪得随时都会爆裂的时代,想胜任这份工作有时候更需要良心、责任心和全身心地投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完全靠着写作来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台上不仅仅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少得可怜的虚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比起文学有着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这么多年我有意无意中运用它的功能惠及了许许多多的人,多数是需要力量化解风雨的小草,也不乏一些需要掌声肯定的大树,这让我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让一个漂泊者得以安宁和踏实。我用第三条命虔诚地写作,可惜这条命没有白天,只有疲惫的夜晚——猫为捕鼠在夜晚出没,我为写作也在夜晚出没,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关掉灯,仅凭着电脑上磷火一样的荧光输入我所需要的文字,所以阳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灯光有时候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们像怀胎腹中的甚至是连夜赶路的人,带着无穷的喜悦、紧张、恐惧和想象。

据说,猫之所以有九条命,与它们善于爬高的本领有关。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楼顶,又可以从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地方掉下来依然毫发无损,相对于人和其他动物而言它们的命就轻盈得多。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猫,同样取决于高于自己本身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一直以来,我把文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在创作《后土寺》的时候,我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命不仅仅是用肉体做的,还应该是用一个个文字做的。再长寿的人,肉体都是会衰老的,都是会腐败的,灵魂都是会游离而去的,但是优秀的文字不一样,它们不像一把粮食,而像一把

诗是由句子和词语组成的,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似乎又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背后的意思,诗、句和词语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当今社会,诗对我们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张新颖新近出版的诗集《在词语中间》便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温暖且精彩的解答。

其实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书名《在词语中间》,乍一听很容易联想到诗人韩东那句有名的“诗到语言为止”,但当你慢慢去读这里面的每一首诗时,会发现二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韩东的名言意在消解通过诗歌来探求和构建意义的创作和阐释,是一种对传统诗学的颠覆与解构;但张新颖的这个书名要结合它的副标题一起读才更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在词语中间——一份与字、词、句相处数十年的自在记录》,诗集里收录的每一首诗都是作者与诗歌、与字、词、句多年相处之后的内化、感悟与所得。或如张新颖自己在《写诗的事——关于〈在词语中间〉》中所说:“与字、词、句子的相处交流关系,与语言相处交流的关系,从意识的模糊缝隙,逐渐开阔为生活的实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写诗不再是无意识地有意识地‘使用’语言。不是‘使用’语言,语言才敞开了。敞开了它自身,也敞开了与万物百汇的关系。没有封闭的语言,也不会去封闭事物。”

如果偏要再追问一句“在词语中间”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是词语、是诗人自己,也是无尽的自然。

一
风吹到句子之间/风吹词语/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

吹到“句子之间”的风一方面拨弄着词语,不断地锤炼和淘洗着文字,另一方面又连通了“旷野”和“字的笔画”,让诗歌扎根于大地,不断吸收自然的无穷给予。整个诗歌的气氛就此一下子扩大了起来,每个句子、词语、字,甚至字的笔画都和整个“旷野”相联系,获得了一种苍茫的力量。

这其中的一首首诗、句子、词语、字和整个旷野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从马赛到巴黎列车上的



大寿之日

《后土寺》后记

一位农民父亲对田园的不舍,一位白领儿子对城市的迷恋,一位留守孙女的两难处境,一脉相承的三代人,陕西既是终点又是起点,上海既是远方又是归宿。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时空的不断转换,道不尽的人生悲欢,意在告诉我们,万物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土地,要热爱那些耕种土地的人。

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致敬每一位热爱土地的人们。

是盛大的,都是值得我们击鼓相庆的好日子。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端午,你要问为什么,我可以说出三条理由:第一,除了端午之外,所有的节日其实都是伤感的,都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坟烧纸,每次跪在他们坟前都要有一股无名的悲伤,而且随着年龄越大时间越长,那些悲伤更加沉重,因为开始是怀念亲人和故乡,慢慢地,是怀念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有离死亡越来越近的自己。第二,端午,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屈原,虽然屈原也是需要纪念的,但是不需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凄切,纪念方式是挂艾草,吃粽子,赛龙舟,吟诗作对,还是非常浪漫的,甚至是积极向上的。说实话,这么多年,作为一个文人,我都是非常开心地度过端午节的,我愿意用任何一天来缅怀屈原,都不愿意在端午节去纪念屈原,原因是生命高于一切,无论你多么爱国,多么不得志,为什么不可以好好活着呢?只要活着,你就可以继续写诗,就还有希望。第三,端午临近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日子的到来,那就是我父亲的生日,这让我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给这个延续了两千年的风俗注入了新内涵。

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二,而现在又是《后土寺》诞生的时间,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在端午节前一个月,突然有人打电话问我陈先生是谁?我说是我父亲。对方说,那就对了,他说你是他儿子。打电话给我的是医生,他说父亲目前正在医院,根据检查的结果是患上了心肌梗塞,一生气,一激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在电话中告诉我,无非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做心脏搭桥手术,一种是药物治疗,但是父亲已经年龄太大,做心脏搭桥手术存在巨大风险,所以他们建议进行药物控制。接到电话之后,我泪流满面,立即推掉了所有的事务,订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在整个回家路上我一直是失眠的,一是担心父亲,二是担心我即将进入尾声的小说还不能继续。当我回到丹凤县城,在医院见到父亲之后,我再一次吃惊地发现,是父亲冥冥之中在指引着我。父亲从来是不愿意进医院的,顶多是让村医开点药或者打点吊针,但是有一天早晨他

感觉身体不舒服,于是糊里糊涂地锁上门,搭了一辆摩托车跑到了县医院——很少进城的他在没有任何人的陪同下竟然找到了县医院。接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姐姐也再三劝说我,父亲应该没有事情,大老远的如果工作忙,还是不用回去了。我打电话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没有说自己的病情,而是告诉我我想我了。果然,当我突然出现在医院,他一下子扯掉了氧气管,拔掉了针头,从床上坐了起来,似乎我就是他的药,如今药到病除了,照着两位姐姐的说法,父亲病情突然好转了,脸色变得红润了,每顿能吃一大碗饭了,状态非常不错。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吵着要回家,理由并不出人意料,无非是几亩地等着下种。

我陪着父亲又住了几天,企图向父亲求证一些关于塔尔坪陈氏家族的故事,也许在我继续修改《后土寺》的时候用得着。可惜的是父亲听力严重障碍,表达能力急速下降,根本无法交流。正在这个时候,我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大堂兄,听到父亲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立即从武关那边的寺庙赶过来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们老太婆的:由于我们的成分不好,老是受人欺负,当时的队长以改河修地为名,要求我们把老太婆的坟从平地迁走,而且必须埋在山上。我们只好听从安排,把老太婆的坟起出来,重新安葬在九龙山上。大堂兄说,哪里晓得一下子埋到了龙眼里,大冬天挖泥巴的时候,泥巴不仅没有上冻,而且从下边冒着热气。我说,假的吧?大堂兄说,怎么会是假的,老太婆是我亲自背上去的,而且是我亲自挖坑埋下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房出了多少人才?你们一个个人发展得好多?剩下我一个没有出息,还是土农民,但是我儿子已经当领导了。我说,老太婆埋的那个地方,上边有一棵大树,下边有一眼泉水,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大堂兄说,再好的风水有什么用?还要有德性!没有德性的人你把他们的老祖先埋在那里试试!肯定就不灵了。我们陈家另外一房,他们的老太婆死了,请风水先生选坟地,据说选在了龙头上,但是埋人的那天,有一条黑狗跑到厨房找东西吃,有一个后人拿起菜刀,砍了黑狗一刀,黑狗不偏不倚,竟然跑到那块坟地,朝着坟地流了一摊子血,他们的老太婆埋在龙头上有什么用?后人照样全部败掉了。我说,这个是假的吧?大堂兄笑了笑,说真的假的不晓得,反正狗血是辟邪的,也是辟邪的,如果后人有德性,给黑狗喂一根猪骨头,风水就不会被破掉了。

德性,多好的词啊!这恐怕是点化众生的最好的法术吧?

在《后土寺》里,陈先生在弥留之际,一会儿在地上抓了抓,一会儿在空中抓了抓,一会儿在陈元的腿上敲了敲,问他干什么的时候,他要么说在拔草,要么说在摘扁豆,要么说在破柴火。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不可想象的细节,在这次住院中,在病床上,在睡梦中,都真实地发生在父亲的身上。我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哪怕我们已经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还是永远离不开土地,又如陈先生的一句话,我不种地,那些地就荒掉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吃的东西总应该是有人种出来的,总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且无论是钢筋混凝土还是机器武器,制造它们的材料归根结蒂不都是从土地里来的吗?于是我写了一首诗:一只鸟向下叫归巢/一束光向下叫照耀/一滴水向下叫流淌/一道闪电,一阵雷鸣,一颗流星/还有粮食和美酒,白昼和黑夜/还有长翅膀的天使和驾云的仙女/以及它们的爱人、孩子和影子/都在向下再向下/无条件地接近大地/最后,

没有谁能留在空中/留在白云间,留在树梢上/留在火焰中,留在浪花里/最后,万物都在返回/光返回是一把泥土/水返回是一把泥土/火返回是大树和小草/再返回是清风和明月/清风和明月再返回/还是一把把泥土/最后,都会和诸神一起/留在地下三尺的地方

所以《后土寺》的用意,就是提醒人们一切都来自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不要忘记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总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你的,是值得你尊重的。不要忘本,尊重土地,尊重耕种土地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德性吗?

听到不是道士胜似道士的大堂兄的一番话,我的头皮发麻,似乎有灵魂一下子附在那几个人物身上。于是在我返回上海之后,立即对那些即将成型的文字,再一次做了系统的修订,这一次修订完成,我完全满意了,起码是安宁了。我不晓得这些被灵魂附体的人物能走多远,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意识恢复了,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可以靠自己行走天下了。

我又问了大堂兄一个问题,我们对爷爷都不叫爷爷,而是叫爹,爹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大堂兄说,我们一代代都这么叫,但是确实不晓得怎么写。最后我与大堂兄聊起了我们的院子,大堂兄担忧地说,那几间房子椽子烂了,瓦也碎掉了,一下雨就漏水。父亲一辈子都很在乎房子,明白我们聊的是房子,于是插话说,恐怕要倒了。我说,我给你重新盖几间新房吧。父亲说,你能给我盖几间新房我死也甘心了。大姐与大堂兄都说,盖新房要花几十万,父亲马上80岁了,我们也不可能回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还是修修吧。修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出钱,由大姐具体请村上的人帮忙。

农历五月初一中午,大姐从塔尔坪打电话来说,全部买的新瓦,换的新椽子,在大家的帮忙下,房顶铺了一遍,地面铺了水泥,而且趁机用石灰把墙刷了一遍。父亲看到房子被修得那么好,第二天又是自己的生日,于是让大姐预备了烟酒,准备在院子里摆两桌子。父亲说,好几十年了,过生日都没有好好热闹热闹了。

农历五月初二清晨,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当我为《后土寺》画上句号,关上电脑,关上窗子,用耳塞子塞住耳朵,窗外的世界立即消失了,那几个人也上路了,留下了几个冗长的背影。我面对着升起来的太阳,朝着一千多公里之外,对父亲说了一句“生日快乐”。当我欣慰地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我的爱人带着儿子从外边回来了,他们从市场上买回来一把艾草,正在用一根红色的绳子朝大门上挂。艾草上还有根,还在滴水,那么新鲜,在上海是不可能生长的。这让我怀疑,这些艾草来自塔尔坪,而且是我当年亲手采摘的——当年端午节的前三天,也就是父亲生日当天,我会把牛放得远远的,把最肥美的艾草采摘回家,挂在我们家的大门上。一切都宛如眼前,一切似乎都刚刚过去,我还没有从童年走到中年,父亲没有从中年走向老年,陈氏家族也没有经历百年,似乎都在一瞬间就发生了。

我像一个分娩过后的母亲,身体的疼痛并没有过去,内心的喜悦也刚刚开始,那个躺在我身边的新生从此自由了,我不需要再靠着胎盘生活了。我对它所具有的,只有牵挂,只有担忧,只有祝福。我想好好地睡一觉,然后起来前往玉佛寺,或者是干脆前往后土寺,几年前我许过一愿,如今大愿悉成,到了应该还愿的时候了。

愿上天保佑文学,愿大地保佑生灵。
(摘自《后土寺》,陈仓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在词语中间》:从生命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诗

□战玉冰

一只橘子):秋天色彩斑斓的原野在车窗外/不间断地一闪而逝/更丰富的景象无尽地迎面而来//我拍下树木 农田 高架线/拍下河流 桥 道路和无名的事物/傍晚斜照下柔和的光辉//但是这一切的中心在哪里呢/高铁车厢的小桌子上/有一只橘子 橘黄色的橘子/小小的橘子 阔大连绵的背景/甚至当镜头里没有橘子的时候/或其实依然把它当作变幻涌现的风景的中心//晚霞点染层云如何描述/人在无助时才按下快门/就是在这个时刻/车窗的反光把小桌子搬到了天空/橘黄色的橘子安然地在天上/周围簇拥着云朵和风的丝丝线条//夜晚来了 外面一片黑暗/是的小桌上的橘子脱落了/任何背景 独自存在/这时才完整显现它自己/它自己的圆满 内部充实 色泽温暖//几年以后 从我记忆的树枝上/它充实到完全成熟/自己落了下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那只“橘子”理解为一首诗,而橘子成熟落下的过程便是诗歌孕育诞生的过程。一个“小小的橘子”,一首正处于酝酿之中的小诗,它有着车窗外“阔大连绵的背景”——树木、农田、高架线、河流、桥、道路、无名的事物。而在诗人眼里,这只“小小的橘子”却是这一切“变幻涌现的”“风景的中心”,“甚至当镜头里没有橘子的时候”。

而在诗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光影开始施展魔法,“车窗的反光把小桌子搬到了天空/橘黄色的橘子安然地在天上/周围簇拥着云朵和丝丝线条”,“橘子”/诗开始接受语言魔法的拨弄,渐渐舒展开来。等到“夜晚来了 外面一片黑暗”,一切自然的背景完全消失,背景的消失就意味着“橘子”/诗的“独立存在”,“这时才完整显现它自己/它自己的圆满 内部充实 色泽温暖”,诗摆脱了最初的印象而初步凝练成形。

但这时还不是写诗的最好时机,要再等上几年,等到当时炙热的情感和写诗的冲动慢慢冷却下来,等“橘子”自己成熟,等“几年以后 从我记忆的树枝上/它充实到完全成熟/自己落了下来”,一首诗便就此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不是“两句三年得”的苦心,不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甚至没有什么缪斯女神附体的灵感爆发,诗歌就像是脑海中渐渐孕育、长大、成熟的那个“橘子”一样,就这样在合适的时候自然地“自己落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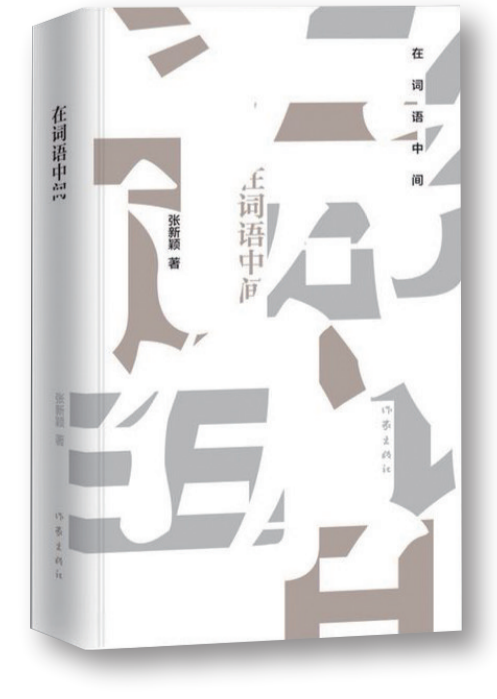
二

在句子、词语和字三者之中,诗人的喜爱程度是不一样的:与文章的交流是表面的/深一层是句子/逐渐老去的人 与词和字相伴

诗人发现了字、词、句愈简单,愈隽永,愈纯粹、愈具有穿透时间长河的生命力:从未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生命/长过其中用到的单个的字和词/即使虚词 也蓄满了亘古以来的风

随着岁月的不断沉淀,诗人越发偏爱爱词与字,这与诗人生活态度渐渐回归平淡、简单有关,而与外在生活逐步简单与纯粹相伴生的是内心的充实和成熟:我囤积了晚年的粮食和/书,我知道这是农业社会的做法/我现在做很少的事/便将来做得更少//生命一点一点消失 一减弱音——不,这才开始/趋向充实和成熟(《趋向》)

在这一趋向的过程中,诗人与诗的关系就如同树和树影的关系一样,彼此支持、相互滋养,在白天树影与树“如影相随”,到了夜晚,“树变成了树影”。树、树影、诗人、诗,彼此的界限在昼夜循环中渐渐模糊,由诗人写下的诗终于回流进了诗人体内,成为充盈其内心的坚定力量:晴空下树的影子/和树一起构成树/树影是树的抽象形式/树影是树的艺术形式/树影也是树坚实的形式/



舒展在道路上的树影/人踏过、车驶过,谣言玷污过/丝毫无伤//暗夜中的树影/回流进树身/于是 树影充盈着树/树变成了树影(《树影》)

三

在整本诗集中,我们能看出张新颖非常讨厌某种框定,这种框定可能是文化市场上的明码标价,可能是学术圈子里的头衔名声,也可能是政治档案中的各栏内容……在诗歌里,这些框定意味着某种粗暴地简化、束缚和限制,长此以往甚至会改变生命自然生长的方向:她深谱配个框子就变成艺术品的道理/她只是不想把生活割下来

一块标价/但她是个出售框子的人//他的个性就是他的框子/框住了整个人生/这正是他追求的以便可以挂到墙上//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把自己切成一块一块/填进了一个一个小框子 填满一份表格/以后他将熟练将不再流血将把人生直接长成表格

不幸的是,这种框定在我们的人生中随处可见,避无可避,或者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割下自己的一块人生来标价出售,甚至还为其价格不尽如人意而焦虑忧愁。我们其实都是那个即将或已经把人生生长成表格的人,我们对陌生人、对亲朋好友甚至对自己的认知也在不断地表格化,以方便我们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里可以更轻松地将这些“活生生的人”分类归档于自己的有限记忆之中。由此,在这个被各种表格框定到异常清晰的社会中,那个“无名的”、“模糊的”、“不那么清晰”的小树林就格外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现在我刚从一个全是判断句的地方逃来/你也许体会过那种铿锵有力如何/聆听的人疲惫/说的人愈发得意愈发顽固/你也就能够明白 我为什么会轻微迷迭/这个夜晚柔和得有点模糊/四周随时有人进出/就叫小树林而没有特定名称的小树林/以及所有未被言语封闭的事物(《小树林》)

或者这本诗集就是诗人的一个小树林,那是诗人逃避“全是判断句的地方”,是诗人躲开被表格框定的人生的一处世外桃源。小树林里树和树影相互滋养,四处徘徊着“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的风,小树林里有一种模糊而简单的美好,有着那些让人神往的“未被言语封闭的事物”。

(《在词语中间》,张新颖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